论俭约

尹荣方

唐代玄宗朝做过宰相的卢怀慎自奉甚俭，他做黄门服侍郎时，家里没有像样的东西，常卧于单席之上；门户无帘子，遇到风雨天常不得已用席子遮风避雨。宋代司马光也以简朴著称，有一次他与范镇等出游，说好各人自带茶叶。司马光用纸包茶，范镇则用黑色的木盒盛茶叶，司马光见了，吃惊地说：景仁（范镇的字）乃有茶具！前人说卢怀慎与司马光天生简朴，不是矫饰。

与俭约相反的是奢侈，不可否认的是，世风常以奢靡为荣，《世说新语》有“汰侈门”，说是讥刺奢侈，却也流露不少叹羡的成分。但奢侈之害，古今中外言之者实众，物质层面且不说，追求奢侈意味着欲望的扩充，奢侈常与贪婪为邻，所为愈奢，而所求也愈多，于是他（她）永远感到不足。于是这些人本心顿失，不仅绝无自由可言，人格往往也趋于低下一流。晋代的何曾穷奢极欲，一日餐费万钱，还说无下箸处。司空贾充权倾一时，何曾党附之，为当时正直人所非。今日之贪腐者，往往亦由奢侈而起。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阿尔贝蒂说：“心灵被贪婪占据，它就受到了奴役。”我国学者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中说得尤明白：“奢则妄取苟求，志气卑辱；一从俭约，则于人无求，于己无愧，是可以养气也。”

俭约者并不鄙视富裕，而是要制约贪婪。谁不向往富裕呢？而富裕每寓于俭约之中，贺拉斯诗云：“我们越节衣缩食，诸神给我们越多。”神（自然）给与俭约者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，孔子说：“以约失之者鲜矣。”这句话，前人解释说：“奢则骄佚遭祸，俭约无忧患。”俭约的好处何止少忧患，更在于心灵的自由与充实。俭约者追求的不是更多地占有，范仲淹退休后，子弟欲为他营建园林住宅，被他拒绝，他说自然中山水处处，何处而不为我有，何必要圈占独享呢？范仲淹式的俭约更合乎自然，用现代话语表述，他这是走向了诗意的存在，于是他平静，他快乐。

俭朴不是吝啬，无论一个人如何富有，如何有德有才，只要一吝啬就光彩尽失。汉文帝自奉俭约，食不重肉、妾不衣帛，却轻徭薄赋，这是真俭约。近日有报章载香港影星周润发虽拥有庞大财产，生活却一直平民化，出行常常坐地铁，也经常步行。发哥还表示死后捐献财产。获知这一信息，在我脑中突显一个俭约的发哥形象，十分高大。但死后捐献不如活着时多行善举，不然要被培根所讥，他是在慷他人之慨了（因为死后的财产不属自己）。

俭约的生活不必贫穷，更不是粗陋，人的物质需求其实不多，吉田兼好《徒然草》云：“人所不得不营求者，一食，二衣，三住居。人生大事不过此三者。不饥，不寒，不为风雨所侵，闲静度日，即为安乐。但人皆不免有病。如为疾病所犯，其苦痛殊不易忍，故医药亦不可忽。三者之上，加药有四。凡不能得此四事者为贫，四事无缺者为富，四事之外更有所营求者为贪。如四事节俭，无论何人当更无不足之虑也。”

吉田兼好的境界我们未必能到，但我们要指出，俭约不是苦行，俭约的生活也可以是精致、丰腴的。元代曲家马致远在讥刺纨绔、富豪骄奢的同时，标榜的是“和露摘黄花，带霜分紫蟹，煮酒烧红叶”的清雅生活。俭约者也喝茶、饮酒、听歌、饰屋，选穿轻软的衣服，品尝美味的食品。但他们不豪夺，不妄求，不暴殄天物，俭约者心中有自然，有他人，他们珍惜所拥有的一切，所以俭约者往往与物不忤，优游自在。

明月二三事

陈丹燕

犬儒

这是一个物质主义无法席卷与浸没一切的世界，神仙们，苹果们和橡树们，与它们抗衡。巫婆们骑着扫帚在夜空里呼呼有声地飞过，仙女们在林中跳舞，美人鱼们悄悄上岸来，化为普通的乡村姑娘，这个不讲究实利与少征的世界，让我的心放松下来，宛如一把尺化为一汪清水。这就是我对爱尔兰这个绿岛最难忘的体验，它一直是我的梦想之地。也有人说，爱尔兰也是世俗社会，一切交易也都在那里进行，只是你闭着眼睛，犬儒。

是啊，也许犬儒。

在我三十岁的时候就有人批评我，并试图改变我。那时我想，如果能一生躲避直面屎一般的那一切，为什么不呢，只面对波涛滚滚的大海即可，这就是好人生，只管闭着眼睛，或者只看你想看的，过完此生好了。

当真好像歌里唱的那样，当你游过大海，能水淋淋地在绿岛上岸，那里是发生多血腥星期天的地方，但仍旧有令人身心舒展的乡村，那里也是希尔看着他爸爸耕作的地方，也是乔伊斯游泳的地方，也是叶芝长眠的小教堂的旁边，也是奥康纳唱歌的地方，你终于有个地方干干净净，偏安于一隅，那难道不幸运吗？

石塘

黄阿忠

石塘是浙江沿海的一个渔村。早先也不为人注意，一直到新千年的第一天，一下子涌进了许多人来这里沐浴世纪第一缕阳光，天下人因此都知道了石塘这个渔村，然我却是很早就知道了石塘，那是因为画画的缘故。当年画家吴冠中先生曾去过那里，我见过他的写生，那错错落落构筑在山坡上的石头垒起来的房子。颇有审美意味。他还有文字对石塘的描写，把美意都留在了字里行间。多年来没机会去那里，心向往之。

日前去浙江玉环考察写生基地，顺道去了石塘，终于见到了心仪已久的渔村。一进小镇，就闻到了弥散在空气中的咸腥味，可以说所有的滨海小镇、渔村都有这种味道。

比方说舟山沈家门，象山石浦，嵊泗列岛等等。闻着海边飘来的咸风，踏上狭窄的街路，沿老街慢慢走去，才发现脚下的石板已被水泥代替。渔民有了钱，首先想的是改善居住的环境，于是两边老屋被翻新成三四层砖砌的建筑，其样式和城里的老式公房相似，亦有方形的，或者是圆形的转角阳台。更有雷同的是外墙面贴有面砖，窗口外有铝合金做成的栅栏，阳光下闪闪亮亮。石头垒的房子不见了，海边的石屋，而今安在哉！我的心忽然被泰山面砖和铝合金条的光亮闪了一下。街上偶尔还能见到一二幢石垒的房子，屋顶和墙体留有青苔和雨水延漏的肌理，岁月的印痕遗存了历史的沧桑。然静谧的小镇被摩托、货车川流的喧闹打乱；质朴的石屋老房拆除，让重建的新居替代，错落间所生出的审美再无踪影。登高眺望，观依山而建之屋或有五十年历史者，寡也；或以估算三十年者亦寥寥。然比起老街两侧来说，这里的老屋还算密集，但房屋几经翻修，总有新砌楼宇夹杂其中，犹如一曲舒缓而和谐的交响中插入嚣响的音节，与沿山鳞次栉比的老屋所散发的沉着、疎野之气息极为不协。筑于坡上的老屋所存无多，

藏于石屋间的审美荡然无存。惜哉！

我不知道为什么天地间自然的气息会在修葺、重建、开发中渐渐消解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规划时受伤的总是审美。

三十年前我去过山东石岛。构筑在海边的是石头垒起的，屋面斜度较陡的房子，其中的形式、色彩画意颇浓；我还去过象山石浦的渔村，大石块垒砌的屋基上用砖木向上搭建，屋顶用的是黑瓦，透出了江南建筑风格的元素。我还记得那个落霞满天的黄昏，屋舍和渔船和虚蒙的暮色构成的那油画感觉。心向往之。我真还想走去这些地方看看，那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不知道那些地方是否还保持着原来的味道？

『子贡问君子』

白子超

为政篇载：子贡问君子。子曰：“先行，其言而后从之。”

此章句逗，向有分歧，本文采纳今之主流意见。曾有古人理解“其言而后从之”为：君子之言令后人准而从之，从而法之。这是粗陋的望文生义，今人已摒除不用。句意其实是“而后其言从之”。后，时间副词。其，代指君子。从之，言说跟随行动而发。故，此章意译为：“子贡问君子是怎么样的。孔子说：‘君子先去做，然后再根据做了的去说。’”

此章阐述君子先行而后言，言由行而生。品德修养要解决诸多问题，根本问题之一就是行与言的关系。先言后行，儒家修养所忌。言而不行，更为人所耻。孔子倡导行动是首要的，看法、观点、体会均需“从之”，从实践中来。

关于行与言，《论语》尚有“古者言之不出，耻躬之不逮也”，古代人言语不轻易出口，是怕自己做不到，而说了做不到是羞耻的（里仁篇）；“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”，君子以说的超过做的为羞耻（宪问篇）；“君子欲讷于言，而敏于行”，君子要说话谨慎，做事勤快（里仁篇）……其义一贯。

《礼记·缁衣》亦载孔子语：“言从而行之，则言不可饰也；行从而言之，则行不可饰也。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，则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恶。”说了跟着就做，说的话就不能掩饰；做了跟着就说，做的事就不能掩饰。因此君子少说话而以行动成就自己的信用，那么民众就不可能夸大自己的优点而掩饰自己的毛病。这段话说明两点：其一，“寡言而行”有利于信用的建立、威望的提高；其二，为民众做出表率，民众便会实事求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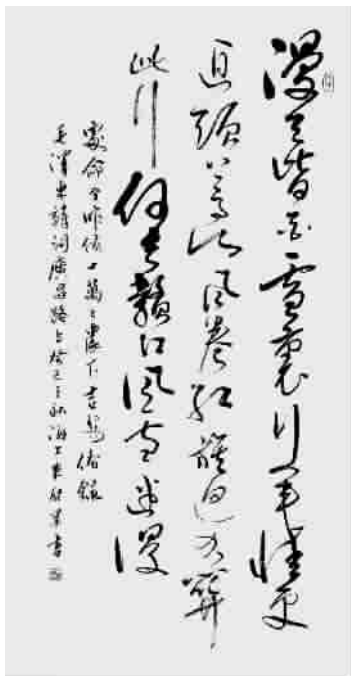
拙文曾释颜渊篇司马牛问仁，说孔子“仁者，其言也訒”是有的放矢，因为司马牛“多言而躁”（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）。这是正确的。但是，读了上引诸章文字，深感仁者言訒实在是蕴含了无比深厚的内容。訒，音认，顿也，与讷义近，出言难貌。不唯司马牛当如此也。

论语新读

孔子诸多话语中，实含先行后言、多行少言、行而不言几种具体情况，皆是君子准则，需择机而定。一般人则与此相反，而其中说得多做得少、只说不做尤显人品不佳。

孔子从品德角度立意，而实际上反映出他的世界观之一隅，具体说是认识论。孔子明确认为“行”是第一位的，“言”是第二位的。人们在行动即实践中感知客观事物，在心中形成认识，然后总结成思想观点，再后才是表达看法和意见。言，不仅指言语，亦包括著作。这是两千五百年前的朴素唯物主义，难能可贵。

孔子说过“生而知之”，但他主要强调的是“学而知之”“困而学之”（季氏篇）。而“学”，根本的是“躬行”（述而篇），再辅之以“文”。从古至今贯有的言行不一、大言炎炎，皆与孔子主张背道而驰。而有识者强调实干兴邦、空谈误国，则是对孔子思想的现代化运用。



书法　朱启荣

树荫连绵新华路

徐　红

很久没去新华路了，想必那里已经树枝如戟，地上枯叶时常回旋而起，一片静谧萧瑟的冬天景象。

1980年，我家从杨浦区搬到新华路，父亲感叹说他少年时来到上海后搬了十次家，这次以后大概不会再搬家了。确实，父母最后都终老在这里，是他们经历中居住最长久的地方。父亲对新华路充满感情，在散文写作中多次写到那儿的风光和人情，如《搬家》《过去的事情》《家在文苑村》等，他在出版散文集时，还把后者移作书名。

新华路，留下了父母生活的许多痕迹。父亲来去匆匆，很少有闲心在马路上溜达，但弄堂口那家新华书店是他经常逗留的所在，尽管常常有不少师友寄赠来的书籍，但他还是要到书店里翻阅新到的图书，有的还买来仔细阅读。他关心自己写作的散文集出版销售情况，会去频繁地询问，一直到上柜销售为之。那家邮局也是他常去的地方，收寄图书，领取稿费，互相熟悉之后，某个营业员会把自己的习作请父亲指教，当然也会推销一些集邮用品。

家里的一切都是母亲来操持，她天天穿行在这条马路上，买菜购物、锻炼身体等，笑容常在脸上。几十年来，她从脚步从容到行走迟缓，看尽了新华路的街景移易和四季变换。后来，母亲拿不动手中的菜篮子了，父亲和她一起开始每天的行程，父亲走得快，常常要回过头等母亲。家里的保姆也加入了行列，一路上，三人行。

后来，母亲终于不能再为家庭贡献什么了，她默然枯坐，反应迟钝。我用手推车载着她在新华路缓缓推行，让她浏览风景回忆往日的故事。母亲对熟人的问候会礼貌地点头，对我的诉说却有一句没一句地答非所问。从春到秋，从夏到冬，从去医院看病到住医院治疗，这一切，都从新华路经过。沈扬先生撰文说，徐开垒提到妻子时，会泣不成声。父亲也对我说过：“你们可以忘记我，但一定不能忘记你们的母亲。”

一个阴沉的下午，我与父亲在新华路散步，徜徉在树荫下人流中。我们说着话，父亲想起了什么，转过头叫了我一声：“秀梅”。“秀梅”是我母亲的名字，一时两人都顿悟她已往生，我们泪眼相对，飒飒的树叶声陪伴着迟滞的脚步，一路默默走回了家。

两年前，父亲也离开了我，那条路上，从此没有我小心搀扶相互话语的人。我怀念新华路，但不大会再到那儿去了，我怕恍惚当中，在某个街角看到父母相伴而行的身影。

锦树繁花

乔　叶

那一天，和赵丽宏先生通电话，忽然听他感叹，说《上海文学》创刊六十年了。六十年？冲到我脑海里的第一个词就是“花甲”。可是，人的花甲和刊物的花甲怎么会一样？这花甲不是那花甲。想来想去，《上海文学》的花甲，重点词也许就在第一个字：花。

可不是么？1953年到现在，六十年里，这本杂志绽放了多少花啊。首当其冲的自是作品的花：《小城之恋》《棋王》《归去来》《冈底斯的诱惑》……作品的花自然映衬着作家的花：王安忆、阿城、韩少功、马原、贾平凹、陈村、张炜……还有栏目的花。我是多么喜欢这些美妙庄严的栏目名称啊：“空间感”“你的微笑”“惘然拾忆”“人间走笔”“城市地图”“上海词典”“日常生活中的历史”“旧简心迹”……一下子就从那么多刊物中跳了出来，既那么“上海”又那么“文学”。还有这些特别的花：1993年人文精神讨论，1995年市民社会与市民文化讨论，2000年“纯文学”讨论……这些花香随风飘散出文学界，在知识界和思想界都热烈出了芬芳。

花开朵朵，《上海文学》是棵锦树。编辑们似乎只是绿叶，陪衬着花，承托着花。但换个角度去看，他们自己何尝不也是花？赵丽宏先生，我从少年时就读他的散文和诗，第一次和他见面是在甘肃《读者》杂志的笔会上。他是那么优雅、清爽和明净。看着他，我有一种做梦般的不真实感。后来见面的时机多了，确认了他的低调平和，面对他我才自如起来。他的画和字，也都印证着他的大才情。金宇澄先生，他话不多，很酷的样子，见面总是微微笑着，说：“给我们写小说啊。”不声不响的，他写了一部《繁花》，拿奖拿到手软。徐大隆先生，这个在大西北当过兵的上海人，说话的腔调虽然很上海，作风却很西北，我在上海读研究生班的时候，他一趟趟跑青浦来看我们，简直像个大孩子一样跟我们泡在一起玩闹，笑起来两个深深的酒窝，是挡不住的天真可亲，小说写得也让我惊讶……这些貌似绿叶的人让我免不了紧张和惶恐：不写出像样的东西，怎么好意思给他们投稿？

还有周介人先生。近日在山西长治，和上海著名评论家程德培先生有缘一聚，闲话时听他说起周先生，和周先生不曾见过，我只有默然静听。周先生是逝去的人，可是他被人这样怀念，怎么会真正逝去？而这样的人，这样的精神，也才是《上海文学》立世的根基吧。

——锦树深沉，繁花茂密。而树和花的存在，都是因为文学。我坚信：因为文学，无论时日多久，树花皆会永盛。正如赵丽宏先生的诗句所言：

爱着，并且被爱着
我们的心灵就永远不会衰老

十日谈

《上海文学》之缘

阳光斜照的房间里，有一位令人尊敬的编辑。